

## N 本期聚焦

## 什么样的需要才称得上“美好生活需要”

陶倩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要准确理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首先就必须对何为“美好生活需要”进行全面的内涵阐释，由此才能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

在我看来，个体的需要包括客观与主观两方面。就客观性而言，“美好生活需要”可以是全方位的。从主观性来说，“美好生活需要”呈现出多层次和多样化的形态。

## 全方位的“美好生活需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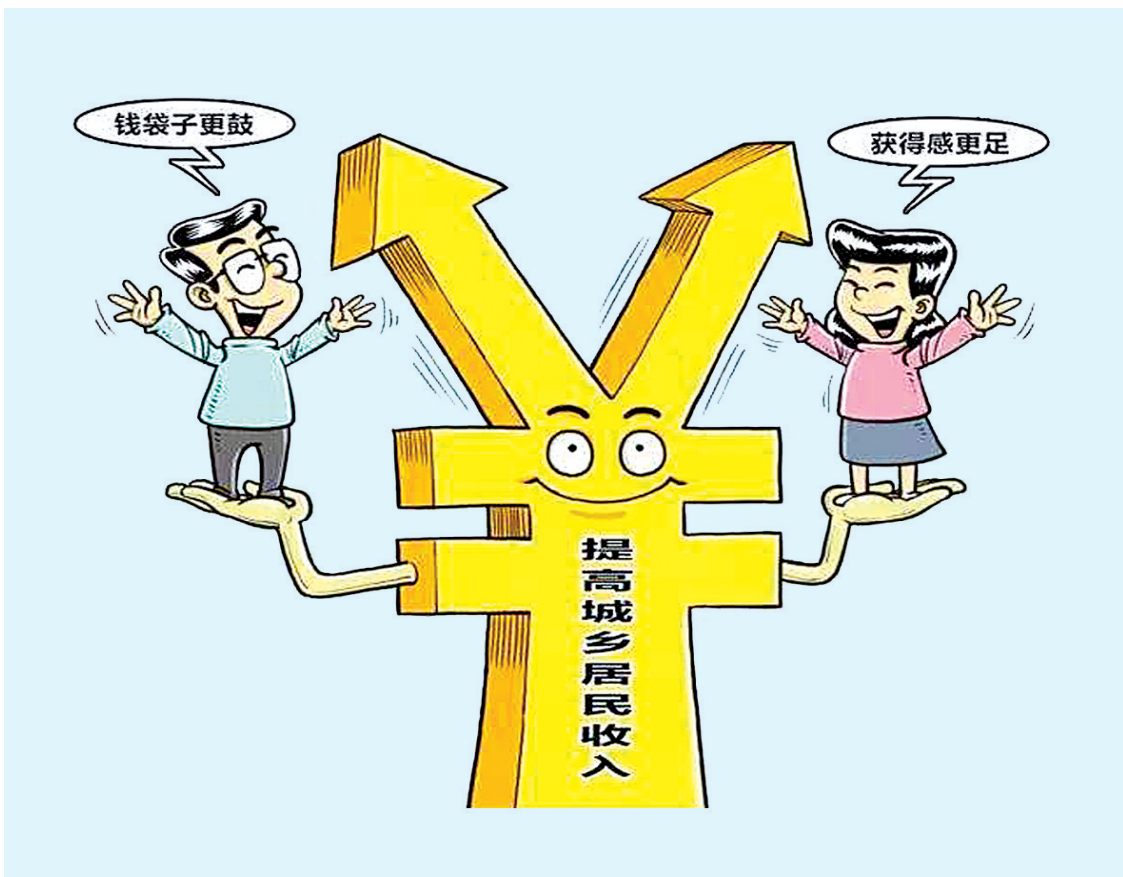
全方位的“美好生活需要”，是指在原来“物质文化需要”表述的基础上依据一定的分析视角加以延展，形成较为全面的新的理解和表述方式。这主要反映的是作为社会人的共同需要。我们看到目前大致有以下儿种理解和表述方式：

第一种，需要种类的扩展。即将“美好生活需要”理解为，由原先较为基础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延伸为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全方位的需要。这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整体布局视角对原先需要种类的扩展。

第二种，融入价值观要素的表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到：“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

第三种，侧重民生获得感的表述。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的“7·26”讲话中指出：“经过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人民群众的需要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期盼有更高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这8个“更”主要侧重于从改善民生水平、创新社会治理视角揭示“美好生活需要”的内涵。

上述三种理解和表述方式是内在统一的，要求充分把握人民群众全方位的“美好生活需要”



新华社发 程硕 作

要”，有助于我们有的放矢地做好供需对接工作，更有效地促进“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尽快实现。

## 多层次的“美好生活需要”

多层次的“美好生活需要”，是指基于共同富裕的前提，不同主体所向往的不同层次的美好生活图景。

以教育为例，不同的个体对“更好的教育”的理解是不同的。对目前我国大多数家庭来说，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就是一种美好生活需要，但是在具体层面上表现出不同的诉求。比如，今年国家对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学生，继杂费免费后，课本费也实现全免费，学生们上学基本不用再交钱了。这对于中西部的广大农村家庭而言，减少一笔不小的开支，他们认为这是美好生活的开始。而对大城市居民来说，有的家长认为花更多的钱送孩子读国际学校是一种美好生活的追求，有的家长则觉得让孩子在家门口普通学校读书，大人孩子不必起早贪黑，免去舟车劳顿，这也是一种美好生活的选择。

再以养老为例，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到，要在“老有所养”上不断取得新进展。随着养老产

业的不断发展，一些老人愿意花费较多资金住进精心设计规划的高标准的养老机构，享受高档、专业、便捷的配套生活服务。但更多的老人即使有些积蓄，还是愿意居家养老，因为他们憧憬着家人团聚、其乐融融的幸福时光。

多层次的“美好生活需要”，既可以是基础层次的目标追求，如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也可以是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等。多层次“美好生活需要”局面的形成，取决于个体对自身经济实力状况等的理性判断，体现了个体对相关各类条件和个体价值追求等的综合考量，这是一种基于主体自觉的多层次“美好生活需要”样态的彰显。

## 多样化的“美好生活需要”

多样化的“美好生活需要”，主要反映了个体的个性化需要。我们要辩证看待个体的多样化需要。现实生活中，由于每个人的成长环境、教育背景和人

生际遇不尽相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诠释会纷繁各异。有的人侧重物质生活的改善，有的人则向往精神境界的提升；有的人强调有品位、上档次是美好生活的呈现样式，有的人则认为随意、简单也是一种淡定、惬意的美好生活。这类“美好生活需要”总体上是肯定或鼓励的。但有些个体的需要，在其个人看来认为是“美好”的，实际却是不甚合理的。如，个体所谓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他人或集体的需要发生了冲突，或者个体超出自身条件去追求不切实际的所谓“美好生活”。对于这些不合理的个体需要，我们应该及时进行调整和修正。

此外，随着社会发展速度的加快，营造良好、平和的社会心态日益凸显其重要性。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从个人来说，不能盲目攀比或嫉妒他人的高标准生活，我们既要量力而行、适可而止地追求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也要尊重和欣赏他人的美好生活，正如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所说的，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作者系上海大学教授）  
来源：解放日报

## N 学者观察

## 产权界定背后的经济原理

王兴康

产权界定需付代价，产权界定越细代价越大，在交换规模较小的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只能把产权界定到家庭，为避免共享物品引发的“公地悲剧”，减少公共财富浪费，必须根据生产力高低界定家庭成员的财产权利。

从生产力与产权制度关系看，生产力水平高，产权界定清楚，生产力水平低，产权界定模糊。比如一颗价格昂贵的钻石，衡量它的重量、色泽、切工与瑕疵，一块普通的石头，只衡量它的重量。同理，交换规模大的商业社会，产权界定清楚，交换规模小的农业社会，产权界定模糊。商业社会往往把产权界定到个人，农业社会往往把产权界定到团体，比如家庭。

产权不界定到个人，必然具备公有性质，从享用角度看，必定是某种程度的公共物品。如果每位成员可以平等地享用家庭财产，那么，必然与享用公地一样引发“公地悲剧”，而且，成员数量越多，权利越平等，“公地悲剧”引发的损失越大（把双头竞争的吉诺模型扩大资源租金消散越多）。

古代中国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寿命短暂，为了抵御自然威胁，保证传宗接代，家庭人口较多。而且，古代绝育技术落后，绝育代价较大，也使家庭人口较多。既然不能减少成员数量，那么，只能改变成员之间的比较优势，才能减少“公地悲剧”引发的损失。

好比存在一个公共湖泊，人人可以前去垂钓，湖鱼越钓越少。随着湖鱼减少，钓鱼代价增加，高手可能一如既往，庸者往往望而却步。钓手技术差异保护了湖鱼繁衍，降低了“公地悲剧”引发的损失。

但是家庭财产享用比如吃饭与穿衣，不如垂钓具备技术含量。这就无法从技术角度表现各人比较优势，降低“公地悲剧”引发的损失。为减少共享家庭财产引发的浪费，只能以身份等级的方式表现成员之间的比较优势。这就是古代中国出现儒家思想与礼仪制度的经济原因。

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意

思是不担心农业社会生产力低下，财富相对贫乏，更需担心财富不按身份等级分配。比如季氏是正卿，观舞只能四佾，他却享用了天子才配的八佾舞，孔子就认为“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

那么，增加谁的权力，减少谁的权利，才能减少共享家庭财产引发的损失？经济学原理认为要素报酬由其边际生产效率决定，谁的生产效率高就把财产享用权界定给谁，才能最大化组织的产出。家庭作为一种投入产出组织，把财产享用权较多地给予对产出贡献较大的个人，较少地给予对产出贡献较小的个人，这样，才能最大化家庭产出。就像企业组织中，企业家对产出贡献往往比普通员工大，把财产享用权较多地给予企业家，较少地给予普通员工，企业才能获得最大利润。

在农耕社会中，一般家庭以粮食生产为主，其他要素相同，决定家庭成员之间粮食产量的主要是力气与经验。相对于幼小的儿子，父亲拥有经验与力气的优势，在农业生产中更具生产力；相对妻子，丈夫拥有力气的优势，在农业生产中更具生产力。所以，儒家以年龄与性别为标准规定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这种符合效率的等级原则走出家庭，进入社会，便由“父父、子子”转为“君君、臣臣”。即移孝为忠，实施同种原则使用公共资源，分配公共收入。具体而言，古代中国社会治理结构分为三个层次：底层为家庭自治，中层为县以下家族自治，顶层为县以上文官治理。无论家庭、还是国家治理都遵循儒家上尊下卑的身份等级伦理。

总而言之，产权界定需付代价，产权界定越细代价越大，在交换规模较小的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只能把产权界定到家庭。为避免共享物品引发的“公地悲剧”，减少公共财富浪费，必须根据生产力高低界定家庭成员的财产权利。家族与国家的公共事务治理也采用同样原则。这就是古代中国以儒家思想与儒家礼仪治理家庭与社会背后的经济原理。

（作者系中国经济学人论坛高级研究员）

来源：深圳特区报

## 观点集粹

## 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有四重视域

卢旭东在《光明日报》刊文指出：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总目标是建立党统一领导下的国家反腐败工作机构，形成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国家监察体系，其重要意义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整合了分散的监督执纪职能，完善了监察制度的顶层设计。通过整合反腐败资源以及强化党对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进一步增强监察职能的独立性，有效破解“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的监察难题。

二是扩大了监督执纪的覆盖范围，解决了当前监察部门、纪检部门监察范围过窄的问题。建立自上而下的国家监察体系进一步明确了监察范围包括六类大吏人员，实现了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三是赋予了监察机关丰富的监督方式、监督手段，解决了监察手段不足难题。四是明确了监察机关的具体职责，解决了监察职能交叉重叠的弊病，大大提升监督执纪的专业化水平。

##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有“五新”

金灿荣在《北京日报》刊文指出，过去五年外交上的理念、风格、实践有很多变化，已经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是新方式。新方式是双轨制，一方面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这是一个新的定位。整个风格趋向积极进取，原来中国外交主要是反应式外交，现在是一个倡议接一个倡议，而且大多数倡议得到了很多国家的响应。二是新理念。针对周边国家对我们很大很紧张的态度提出四点主张：中国决不会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来发展自己，也决不放弃自己的正当权益，任何人不要幻想让中国吞下损害自身利益的苦果；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中国发展不对任何国家

构成威胁；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针对发展中国家对我们的期待越来越高，提出了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等。三是新方式。新方式是双轨制，一方面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体系内积极发声，在联合国、WTO、IMF积极发声，另一方面在美国以外开始搞自己的体系，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经济方面建设的亚投行。四是新战略。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美国也跃跃欲试要加入进来。五是新实践。稳定大国关系，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开始塑造周边关系。以前我们是顺应，现在我们要塑造，特别是战略机遇期。

## 用法律和经济手段降低企业“走出去”风险

吴志成在《人民日报》刊文指出，当前，“一带一路”建设正在深入推进，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深入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创造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同时也应看到，相关国家在经济发展、国家治理、社会发展、人文环境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会给企业“走出去”带来一些风险和挑

战。如何应对？可以用法律和经济手段降低“走出去”风险。应充分了解相关国家的国情、市场情况和竞争环境，加强形势研判和事前预防预警，制定企业海外利益维护和风险应对预案。与此同时，发挥开发性金融机构的引领作用，利用现有国际担保机构化解和分担投资风险，建立完善海外投资金融支持体系和担保机制，为企业“走出去”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完善风险评估机制，组建专门的综合性服务平台和网络信息系统，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信息咨询服务、财务法律技术支持等，用法律和经济手段有效降低企业投资和生产经营风险。

## N 中外文化

## 究竟如何界定中国文化

葛兆光

在研究中国文化的时候，首先会碰到一个难题，那就是如何界定中国文化。

过去大家可能读过一些有关中国文化的书，可是这些书里，常常堆满了一些泛泛而谈、似是而非的讲法。

大家知道，从晚明清初开始，中国被带进世界的视野，从那时起，很多有识之士开始重新探讨什么是中国，什么是中国文化。为此，在晚清到民国初年，也就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的这段时间里，出现了很多讨论中国文化的书籍。

举一个例子，大家知道最早讨论中国文化的人里面，有一位非常著名的学者叫梁漱溟。他在书中提到，中国文化有很多方面的特征，比如，广土众民、多民族同化融合、历史长久、赋予和平精神等，他在书的最后还总结

了10条中国文化的特点，包括自私利、勤俭、爱讲礼貌、爱面子、和平方弱、知足自得、守旧、马虎、坚忍及残忍、圆熟老到等等。但是，这些论述并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是中国文化。

此外，学界还有很多中国文化概论之类的书，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出现了一些有关中西文化对比的书籍。学者们在总结和论述中国文化时，往往采取高度概括和抽象的方法，比如有这样一些说法，说西方文化是向前的，印度文化是向后的；西方文化是热的，中国文化是冷的。这些概念往往空洞、抽象，又似是而非。还比如，有一种对中国文化高度概括的说辞，说中国文化具有独创性、悠久性、统一性、保守性。但是这些文化特征，别的国家就没有了吗？

如何界定中国文化，确实非常困难。不过一些学者的做法让我们受到了启发。美国清史专家

罗·威廉著有《哈佛中国史·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他在撰写清代汉族和非汉族在文化上的差异时，着重列举了他们之间的一些具体差别，比如从夫而居的父系家族、有秩序的祭祖、使用汉字和用汉语思维表达、使用筷子等饮食习惯、以农业定居的方式生存，这些都是汉族中国人区别于非汉族中国人的特点。这给了我们一个启发，当你讨论文化时，一定要讲得具体明确，让人一看便知。如何界定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一定是中国有、其他国家没有，或者说中国比较明显、其他国家不太明显的一些特征。

所以，要界定中国文化，我们可以提出五个明确的特征。

第一，用汉语思考，用汉字表达。以前有汉字文化圈，比如日本、朝鲜、越南都使用过汉字，但是他们用汉字书写却不用汉语思考，也不用汉语进行日常交流。

第二，家族性。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到了中国的家庭、家族和家族共同体，“家国同构”又使家和国在组织结构上具有共通性，家是国的缩小，国是家的放大。而这样的社会，是以儒家思想和儒家礼仪制度为基础的。

第三，中国的宗教信仰特点是儒释道三教合一。儒家、道教、佛教都没有绝对性和唯一性，彼此融合，没有宗教性冲突。

第四，以阴阳五行观念为主的知识体系。在这一点上，中国人是以独特的视角在观察世界，掌握世界，改造世界。

第五，中国人特有的天下观，以及由这些观念产生的政治制度，比如朝贡等政策体系。

在我看来，这些才是中国文化特有的、而且是比较明显的特征。

（作者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特聘教授）